

从文化族类观到国家民族观的嬗变

——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

平维彬 严 庆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从朴素的“类族辨物”观念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中国民族观经历了由“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性蜕变。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文明连续统”中,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场“宏大的历史叙事”,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同时,也挟带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本文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探寻古代文化族类观向现代国家民族观的演变历程,并试图从传统的儒家族类观、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三个方面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

关键词:文化族类观;国家民族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7)04-0001-06

DOI编号:10.13965/j.cnki.gzmzyj.2017.04.001

Transmutation From Culture-Nationalism to State-Nationalism: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PING Wei-bin YAN Qing

(Chinese Academy of Ethnic Theory and Ethnic Polic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national view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oncept of “classification” to the initiation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thousands of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continuum”, the Chinese nation itself is a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on”. Especially in modern times, when the Western colonists broke into China with guns, meanwhile they brought Nationalism and awakened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 try to explore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ancient Culture-nationalism to the modern State-nationalism and try to find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rom the view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Nationalism and Marxism national theory.

Key words: Culture-nationalism, State-nationalism,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族类观

(一) 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理念背后是儒家传统思想对天下秩序的安排,“中国”、“四方”、“畿服”、“外

藩”等地理空间名词正是在这一政治秩序中产生的。“天下观”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后被儒家学者建构为中国封建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1]作为儒学政治思想对政治秩序的设想,“天下观”

收稿日期:2016-12-9

[作者]平维彬(1989-),男,山东聊城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政治、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严庆(1970-),男,河北乐亭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与多民族国家建设、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教育。

既是包含了“四海”、“五方”、“九州”等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世界观,又是糅合“畿服”、“大一统”、“夷夏之辨”等政治理念上的国家观。同时,“天下观”的内容也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不断变化。赵汀阳认为天下有着三层内涵,即“地理学意义上的土地、社会学意义上的民心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制度”^[2]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华夷之辨便是生发在“天下观”之下的,以文化、礼俗、疆域和制度理念的差异来区分不同族类集团的族类思想。

华夷之辨又称为夷夏之辨,用来区分华夏和其他族类。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政权,它既是以一个国家政权的面目出现,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3]夏族的名称随夏朝建立而产生,“华”则是形容夏族服饰文化的特点,在与外族不断地交往过程中,“华夏族”的名称得以产生。由于华夏族当时是经济文化最发达、力量最强大的集团,认为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故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国”的概念生发了对天下秩序的思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四海”、“五方”、“九州”等地理名词。那些居住在夏族周边,在“文化、服饰、饮食”等方面不同于夏族的其他民族集团被称为四方的“夷人”,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秦汉之后,又以夷夏之间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夷夏殊异的民族观进一步得到强化。但是,夷夏之别也并非绝对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所以,在“华夷之辨”思想基础上产生了“用夏变夷”和“华夷一统”思想,即用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汉)文化来改造周边发展较为落后的族类群体,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大辽萧太后改革”就是实践这一思想的典型案例。

(二) 华夷一统

儒家的“大一统”理念表现在族类观方面,即是“华夷一统”。“大一统”理念生发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包含了政治、社会、礼俗等要素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体系。战国之后,秦汉一统天下,国家疆域不断扩展,治下族类逐渐增多。西汉时期,董仲舒吸收阴阳学、法家、墨家等学派思想改造儒学,提出“天命观”和“大一统”。“大一统”理念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成就了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的特点——“超稳定结构体”^[4]。表现在儒家文化圈中族类关系的

处理上,就是王朝统治者所宣扬的“华夷一统”。

“华夷一统”理念既承认华夷之别,同时也强调华夏与诸夷、内地与边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秦汉首次实现大一统,始皇帝嬴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南征百越、北击匈奴,修灵渠、建驰道进一步加强统治疆域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隋唐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民族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所以,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正反映了隋唐时期“华夷同重”的思想。及至宋、辽、金时期,出现了南北分立政权的“正统之争”,但此时的“正统之争”依旧是在“天下观”和“大一统”的体系内争立正统。元朝疆域空前扩大,在地方设立行省,中央设置宣政院,并提出“天下一家”思想。明朝提出“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以及清朝的“君主专制大一统”都将“华夷一统”的族类观作为处理域内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三) 儒家族类观的实质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时期的族类观实质上是一种糅合了礼俗、血缘、地域等要素的文化族类观。随着中国帝国时代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治下族类不断增多,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社会通婚、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族类关系逐渐超越了非此即彼地简单对应。先秦时期,传统的夷夏观已经形成,这一时期不同族类多是以“礼”为区分标准,合乎礼者则为中国之华夏,不符者则为四方之“夷”“戎”“蛮”“狄”。郝时远认为,“先秦中国以教来教化天下,有教则无族类之分”^[5]。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逐渐形成,在统一的王朝体系下族类群体在族际接触的过程中,先进的华夏(汉)文化的涵化功能日益显现,这也是费孝通先生所言汉族“滚雪球式”发展融汇的力量之源。

李大龙认为,“以文化区分族群是中国王朝国家族类观的主要内容。”^[6]金耀基认为,“中国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state)”^[7]。以中国这个古代文明体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族类关系作为政治秩序设置的主要考虑因素,也在这一思想高屋建瓴式的指导之下统筹进了封建王朝体系的政治秩序安排。清末民初,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遭到西方殖民

体系从边缘向中心的步步蚕食，传统的“天下”体系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下开始崩塌，以儒家文明为内核的文化族类观也开始向支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基础——“国家民族观”转变。以“大一统”理念为精神内核的文化族类观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规约下进一步强调天下一统、多民族统一于“大一统”政权的观点，这是中国区别于西方民族主义建国初期帝国分崩离析的文化根基，也是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裂变的凝聚性文化根源。

二、西方民族主义的本土化

（一）中华民族观的诞生

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标志着区别于中国帝国时期和西方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观”开始形成，并逐步成为中国这一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思想基础。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将“中华”和“民族”两个词合而为一，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时，梁启超并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做详细地阐释，碍于对“中华”和“民族”两个概念理解的局限性，这时他所指称的“中华民族”还只是由华夏族发展而来的汉族。之后，梁启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度地挖掘，进一步阐述了“中华民族”与历史上“诸夏”、“诸夷狄”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中华民族自始即是多元的结合，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融汇化合，逐步混‘成为数千年来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8]。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沿着“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的途径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融合成为坚强稳固的世界第一大民族。^[9]这一观点为后来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早期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和传播多是以费正清式的“冲击—回应”理论（impact-response approach）为基本范式。清末民初，殖民主义荼毒日益严重，传统的天下体系在殖民者强制的秩序安排下崩塌殆尽，西方殖民者为了更好地控制东方这一“庞然大物”，妄图将这个文明体国家肢解成“印度式”的诸多邦国。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写道：“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但可合五为一，

而不可分一为五。”^[10]他提出的“五族合一”思想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同时也强调了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的不可分割性，初步具备了近代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内涵。“五族合一”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族类观的继承与发展，其思想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成分可能其本人也未曾觉察，但文化族类观向国家民族观的嬗变已经顺势开始。

（二）从“驱除鞑虏”到“国族建构”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清王朝体系崩解的过程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主张以唤起革命群众的民族情绪，但旧有的封建王朝体系崩解之后，才发现这种狭隘的“排满”论并非对现代民族思想的理性解释。革命时期歇斯底里式的“排满主张”，明显地带有大汉族主义的鼓动色彩，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这一狭隘的“排满”思潮也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在游历了诸多欧美国家之后，接受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基本路径和支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思想。早期民族国家的建构多是沿着“民族—国家—国族”的路线进行，即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而当这一思潮延伸到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其路线不得不变成“多民族—国家—国族（含多民族成分）”，要建立多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得不对国内的各民族进行整合，即形成国家民族（nationality）层面的国族。

辛亥革命成功后，旧有的封建政治秩序逐渐被打破，中国开始徘徊于儒家传统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痛苦地挣扎，期间虽不乏“袁世凯登基”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但中国的发展大势已趋向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无法扭转。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提出“五族共和”“五族一家”理念，他认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民。是曰民族统一。”^[11]这一时期，“五族共和”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思想在军阀混战的政治环境中无法达到族际整合的政治目的，并且中国除上述五个民族之外，还有诸如哈萨克、彝、苗、瑶等其他民族的存在，这里所指称的“五族”无法代表中国所有的民族。在考察分析了欧美诸多民族国家之后，孙中山在中国开始提倡类似于美利坚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民族熔炉论”。他主张

“汉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11]。孙中山此时的中华民族观实质上是以同化为理论基础，以汉族为核心熔冶其他民族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这是一种“扩大化了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12]。蒋介石则进一步将这种中华民族观沿着“家族-宗族-国族”的发展模式，由宗族主义扩充为国族主义，即由“宗族观”取代了“民族观”，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强调各宗族的融合是对抗外敌侵略的唯一有效途径。国民党只承认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存在，而否定国内各个民族的存在，既忽视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也不能体现国内各民族不同的利益诉求，势必无法有效地将各族群众整合进统一的政治体系。

(三)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观的辩论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日本帝国主义既从政治实践层面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鼓吹华北五省自治，又从政治理论层面炮制了“满蒙非中国论”企图肢解中国。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学界志士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为基础对“满蒙非中国论”进行了驳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这一观点得到傅斯年、白寿彝、张维华等人的支持。顾颉刚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傅斯年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操统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13]。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的观点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在抗日救亡的社会环境下，有助于增强国民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起到内向凝聚的社会效应，符合当时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但从学理上来讲这一主张却并非十分科学，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无论从文化、语言、体质等各方面来讲中华民族都是多元的。

费孝通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分析角度出发，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的论断。他指出“文化、语言、体质可以是人口分类的标准，也可以是社会分化的标帜。”中华民族的多样性是基于历史、文化、地理、体质等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中国人

民不仅在文化和体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社会发展状态上也存在着诸多分歧。为了谋求国内的政治统一，而忽视其他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的存在，是一种主观臆断且不科学的做法。费孝通也清楚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假借“民族自觉”分化中国的图谋，团结国内人民一致抗日。他认为，防止敌人的分化不是主观地消弭民族（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间的分歧，而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使国内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都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权利，这样大家才能在统一的政治体系中获得切身利益，进而维护整个政治体系。

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是中国封建帝制崩溃之后，政治制度和秩序重建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梁启超“虚君共和”的制度设想，也包括孙中山“民主共和”的思想主张，同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自决”以及之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设想。西方“民族”（nation）概念中所蕴含的“人民权力”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并逐步演化为中国语境中“56个民族构成的人民的权力”。及至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话语体系的“民族”逐渐成为中国语境中的“汉族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作为有着两千多年“大一统”历史传统的多民族国家，这种转变内在体现了族类群体承认与政治权利享有的政治价值意涵。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一)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进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政治动员时，已经潜意识地将中华各民族纳入到中华民族的整体之下，暂且摒弃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次级民族身份之分，依靠共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使命将中国各民族群众动员起来，整合成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达到一致抗日的政治目的。在解决中华民族和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认同张力时，“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渐趋发展成熟，逐渐从意识层面的理论构想变为制度层面的政治实践。“历史使民族和民族国家殊途同归，……‘自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和越来越多的民主的历史选择。”^[14]创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民族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其民族观多受到苏联民族思想的影

响，主张采用“民族自决”的方式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在经过第一次国民革命、第二次国民革命、长征和抗日战争的淬炼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实现了由“民族自决”向“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转变。

缺乏民族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解决民族问题时多照搬苏联经验，主张采用“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模式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断成熟，逐步发现这两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处理西北蒙古族、回族政治动员的问题时，逐渐发现“民族区域自治”不仅能够解决政治动员的革命需要，而且克服了国民党民族理论否认其他民族存在的弊端。1937年，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8]1938年以后，民族自决的主张逐渐被民族自治思想取代，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理论应运而生。1941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19]1947年，在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作为国家层面上的民族（nationality），实现了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统一。^[20]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趋于理性，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新中国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制度基石，并在意识层面上摒弃了“中国本部”和“边疆外藩”传统观念的束缚，给予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和自治权。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落实和少数民族意识的增强，中国各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张力再次凸显出来，为了解决由“民族”词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理解混乱，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国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1]费孝通先生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长河中展开论述，回答了“中

华民族的含义、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和‘自觉实体’、多元和一体的辩证运动”^[18]等问题。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自觉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程，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7]在这里，费孝通强调的“多元”是“在中华民族统一体内部的多元，是构成中华民族五十多个民族单元的多元，是中华文化起源的多元”；“一体”则是五十多个民族单元共同构成的统一体，是在联合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觉醒的政治共同体，而并非消融了民族个性追求同质的“一体化”。著名民族学家宋蜀华先生对此评价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认识中华民族整体结构的一把钥匙。”^[19]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论断，既符合我国多民族发展的基本历史，又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不仅解决了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观”的困扰，而且在政治实践中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国内学术界的讨论热点，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建构路径的文章层出不穷。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不单单是词汇上的简单变化，更标志着国内民族理念和民族工作部署的转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形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治和命运共同体。

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建构和发展的维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有历史和文化层面的精神文明意涵，又包括了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物质文明价值。朱碧波认为，中华民族形成与演变的悠久历史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深厚的时空基础，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要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重维度进行建构。^[21]杨鹏飞则强调了中华民族之“实”，明晰了共同体内部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以中华民族

共同体认同为逻辑前提,整合国内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22]结合政党认同、文化接触、社区互嵌和经济互助的理论多角度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四、结语

在多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内多民族政治整合的层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范式,也超越了中国历史上“天下一国家”的文明体系建构模式。从“异域”到“旧疆”,从“离散”到“整合”,在“大一统”的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中华民族不只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发展基础和共同前途命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脱胎于历史悠久的传统帝国,型塑于近现代的革命和建设进程,是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23]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演变,更凸显了“共同”的价值意涵——“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精神文化、共同的责任使命、共同的前途命运”。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和历史文化的一脉相连,都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政治资源,共同推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和多民族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吕文利. 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3, (3): 2.
- [2] 赵汀阳. 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60-61.
- [3] 彭建英. 论我国古代民族观的演变[J].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3): 56.
- [4] 陈理. “大一统”理念中的政治和文化逻辑[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2): 7.
- [5] 郝时远. 先秦文献中的“族”和“族类”观[J]. 民族研究, 2004, (2): 36.
- [6] 李大龙. 从“天下”到“中国”: 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309.

[7] 金耀基. 中国政治与文化[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177.

[8] 梁启超. 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饮冰室专集之四十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9] 陈其泰. 20世纪初民族观的历史演进——兼论历史文化认同在中国近代的发展[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5): 82.

[10] 刘晴波. 杨度集[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304.

[11] 孙中山全集, 第二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

[12] 郑大华. 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J]. 民族研究, 2014(2): 64.

[13] 周文玖, 张锦鹏.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辩论的考察[J]. 民族研究, 2007, (3): 24.

[14] 李红杰. 由自决到自治[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265.

[15]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50.

[16] 周平. 中华民族: 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J]. 政治学研究, 2015, (4): 22.

[17]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1.

[18] 陈连开. 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学术新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评述[J]. 民族研究, 1992, (6): 21-27.

[19] 宋蜀华. 认识中华民族构成的一把钥匙[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3): 25-26.

[20]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14-9-30, (1).

[21] 朱碧波.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6, (1): 26-32.

[22] 杨鹏飞.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和实践[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1): 83-93.

[23] 严庆. 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 48.

(责任编辑: 周真刚)

(责任校对: 教惠)